

从“感性对象性”到“实践对象性” ——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与超越

王歆然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1日

摘要

费尔巴哈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占据关键地位。他以“感性对象性”原则颠覆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 并以人本主义伦理构想阐释人与人的对象性关系, 但其理论存在显著局限。马克思在继承费尔巴哈对象性思想的基础上, 通过引入“实践”范畴, 完成了从直观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变革。本文以对象性理论为线索, 梳理两位思想家的理论关系与根本分歧, 阐释马克思如何将哲学视阈从解释世界的抽象伦理转向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 最终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新世界观”。

关键词

对象性, 实践, 感性, 费尔巴哈, 马克思

From “Sensuous Objectivity” to “Practical Objectivity” —On Marx’s Critique and Transcendence of Feuerbach’s Philosophy

Xinran Wang

College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e 15, 2026; accepted: July 7, 2026; published: July 21, 2026

Abstract

Feuerbach’s philosophy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link in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 He subverted Hegel’s speculative philosophical system with the principle of “sensuous objectivity” and elaborated the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 of human beings through humanistic ethics, yet his theories have prominent limitations.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rational core of Feuerbach’s theory

of objectivity, Marx introduced the category of practice and accomplished a philosoph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intuitive materialism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aking the theory of objectivity as the main thread,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theoretical connections and fundamental divergences between the two thinkers. It illustrates how Marx shifted the philosophical vision from abstract ethics that merely interprets the world to revolutionary practice that transforms the world, and ultimately established a new worldview rooted in practice.

Keywords

Objectivity, Practice, Sensibility, Feuerbach, Marx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中，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中间环节”角色[1]。费尔巴哈以清醒的唯物主义对抗黑格尔神秘的唯心主义，用“感性对象性”原则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然而他的理论却停留在直观的、非历史的层面。深入考察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对象性理论上的对话与决裂，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其理论的革命性本质，更能把握其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深刻转变。

要探究马克思“对象性”思想的发展与超越，德国古典哲学中相关概念演变的梳理是关键一环。从康德的“对象”，再到黑格尔的“对象性”，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推动马克思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对象性”思想。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演进脉络中，康德率先区分对象与客体，立足主体性认识论提出认知对象由主体感性与知性共同建构，却割裂认知与实践、陷入二元论；费希特以绝对自我统摄对象，将对象视作自我设定的非我，突出主体活动的实践向度；谢林进一步区分绝对自我与经验自我，依托自我意识探寻主客同一，二者为对象性概念的诞生铺路。黑格尔正式确立“对象性”范畴，将其视为精神自我外化、扬弃异化并复归自身的思辨形式，把对象性活动归结为抽象的精神劳动，始终局限于纯粹意识领域。这一思辨化的对象性传统，既为费尔巴哈颠覆唯心主义、提出感性——对象性原则提供了理论参照，也反衬出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重构对象性、却滞留于静态直观的理论局限，最终成为马克思扬弃二者、将对象性锚定于现实感性实践，完成从“感性对象性”到“实践对象性”理论跃迁的重要思想源流。

本文旨在以“对象性”概念为核心线索，通过文本细读与比较分析，阐明以下问题：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与人本主义伦理有何内在联系？马克思如何在继承中逐步发现其局限？最终如何通过“实践”范畴实现哲学的根本变革？论文将首先剖析费尔巴哈的理论体系，然后考察马克思的继承与批判，最后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超越性意义，力求呈现一个清晰的思想演进图谱。

2. 费尔巴哈的基点：作为感性直观的“对象性”与人本主义伦理

2.1. 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颠覆

费尔巴哈哲学的历史出场，首先是以黑格尔批判者的姿态完成的。黑格尔将“绝对精神”作为主体，把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仅仅看作这一精神的外化或异在，这在费尔巴哈看来是本末倒置的思辨虚构。在他看来，黑格尔的绝对哲学脱离现实、沉溺于纯粹思辨。而费尔巴哈提出：“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2]这是对黑格尔哲学的颠覆——它宣告了哲学应当从思辨的天国

回归感性的尘世。他还进一步阐述：“哲学的开端不是上帝，不是绝对，不是作为绝对或理念的宾词的存在。哲学的开端是有限的东西、确定的东西和实际的东西。” [2]这种对“实际的东西”的强调，为唯物主义重新奠基。

然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有其特殊形态。它不同于 18 世纪法国机械唯物主义，而是强调“感性”的首要性。他将人与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但这里的“自然”不是机械论意义上的物质集合，而是与人息息相关的、感性的自然。这种以人和自然为核心的新哲学，正是通过“对象性”原则展开的

2.2. “对象性”的内涵

“对象性”概念在费尔巴哈哲学中占据中心地位。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阐述道：“一个实体是什么，只有从它的对象中去认识；一个实体必须牵涉到的对象，不是别的，只是它自己的明显的本质。” [2]这意味着，任何存在物的本质都在其对象性关系中显现。比如，人对自然界就存在着对象性依赖。费尔巴哈强调：“人没有对象就不存在。”这里的对象首先指自然界。人呼吸需要空气，渴了需要水，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表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依赖于自然界的对象而存在。这种依赖不是外在的、偶然的，而是构成性的——人的本质正是在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中形成的。他精辟地指出：“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饮食这一最基础的对象性活动，塑造着人的生理存在乃至精神气质。只是包含在共同性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他人不是与我对立的客体，而是确证我之为主体、使我成为人的必要条件。我的意识需要另一个意识的承认，我的爱需要另一个人的回应。这种主体间的对象性关系，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

除此之外，人对他人也有着对象性的确证。这是费尔巴哈最具创见的思想之一。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我－你”关系理论：“孤单的、个别的人，不管是作为道德实体或作为思维实体，都未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共同性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 [4]他人不是与我对立的客体，而是确证我之为主体、使我成为人的必要条件。我的意识需要另一个意识的承认，我的爱需要另一个人的回应。这种主体间的对象性关系，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

然而，费尔巴哈理解的对象性关系具有鲜明的特征：直观性。费尔巴哈的“人”是“纯粹孤立的生物个体”，他忽视了人类的社会性。在社会领域中，费尔巴哈以抽象的“类”作为人们的共同属性。他还反复强调“直观”的重要性：“直观提供出与存在直接同一的实体。” [3]这种直观是静观的、被动地接受，而不是能动的创造。人面对自然，主要是感知它、欣赏它、依赖它，而不是改造它；人面对他人，主要是直观其“类本质”，在情感上与之共鸣。对象性关系被理解为既定的、直接给予的，而不是历史地生成和变化的。这种关于人的类本质的理解，也催生了他独具特色的人本主义伦理思想。

2.3. 人本主义伦理：对象性关系的伦理升华

对象性原则必然导向人本主义伦理，这是费尔巴哈思想的内在逻辑。如果人的本质在于对象性关系，而最完满的对象性关系是“我－你”之间的情感联结，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爱”便成为最高的价值原则。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结尾处慷慨陈词：“爱是存在的标准——真理和现实的标准。爱我吧，这样你就会知道我的爱是真实的、是现实的。” [4]

面对现实社会中的分裂、隔阂与冲突，费尔巴哈寄希望于普遍的情感与善意，主张以共情与友爱凝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坚信，人与人本然的情感联结能化解现实矛盾，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因此，费尔巴哈把这种“爱”的情感力量当作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面对现实中的分裂与冲突，费尔巴哈诉指出：“我们必须重新回到爱，回到同情，回到感情！只有通过感情，人与人才能联合起来。”他甚至还更

明确宣称：“爱创造奇迹。”

然而，这一伦理构想暴露了费尔巴哈理论的深层缺陷：抽象性与非历史性。他所说的“人”是抽离了一切社会规定性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类存在”；他所说的“爱”是超越历史条件的、普遍的情感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爱是类之完善性之理念。”这种将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还原为道德情感问题的做法，注定了其理论的乌托邦性质。费尔巴哈没有追问：为什么在现实中“爱”无法实现？什么样的社会条件阻碍了爱的普遍化？他止步于对“应有”的道德呼吁，而未能分析“现有”的社会根源。

费尔巴哈哲学的进步意义不容否认——他恢复了唯物主义的尊严，将哲学从天国拉回人间，确立了人的核心地位。但他的理论存在三大根本局限：直观性(被动地反映既定的对象世界)、非历史性(看不到对象性关系的历史生成)、抽象性(脱离具体社会关系谈论人与爱)。正是这些局限，成为了马克思批判的起点和超越的契机。

3. 马克思的继承与初步批判：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3.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继承与萌芽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对费尔巴哈给予了极高评价，称其为“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5]。这一时期，马克思大量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对象性思想，但已开始孕育不同的理解。

“对象性活动”这一概念，是对“劳动”的哲学奠基。马克思同样从对象性出发理解人的本质：“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这段话有两点突破：第一，人的对象化不是静观，而是“设定”，是能动的活动；第二，这种活动被明确为“劳动”。马克思指出：“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至此，“对象性”开始与“劳动”这一特定的人类活动结合。

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对对象性关系的扭曲形态。在《手稿》中，马克思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象性关系的异化。这种异化表现为四个方面：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产品作为异己的力量统治劳动者)；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异化(劳动不是自我实现而是自我牺牲)；劳动者与类本质的异化(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表现为阶级对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我-你”关系具体化为生产者与占有者的对抗关系。他写道：“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6]这里已经隐含了对对象性关系的社会历史分析。

尽管仍在使用“类本质”等费尔巴哈术语，但马克思的关注点已经转移。他不再探讨抽象的“人”，而是分析“工人”这一特定历史身份；不再颂扬普遍的“爱”，而是揭露现实的“剥削”。对象性关系不再仅仅是情感的、自然的纽带，更是在特定生产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关系。这是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最初征兆。

3.2. 《神圣家族》中的进一步区分

在1844年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开始更明确地与费尔巴哈保持距离。书中虽然还有费尔巴哈影响的痕迹，但已出现重要区分。

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指出：“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7]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费尔巴

哈的唯物主义停留在“理论方面”，而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进入了“实践方面”。更关键的是对“群众”概念的强调。针对布鲁诺·鲍威尔蔑视群众的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里，“群众”不是费尔巴哈抽象的“类”，而是具体的历史行动者。

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开始触及对象性关系的物质基础。在分析法国唯物主义传统时，他注意到爱尔维修等人已经将唯物主义引向社会领域，认为“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虽然马克思不完全赞同这种功利主义伦理，但他意识到：人的对象性关系(包括道德关系)需要从物质利益角度理解。这为他后来从抽象情感转向现实利益分析埋下了伏笔。

3.3.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决定性的批判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十一条提纲虽然简短，却完成了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系统清算，其中对对象性理论的批判是核心。在该提纲中，马克思完成了对直观性的彻底颠覆。开篇第一句就直指要害：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段话有四个关键词：“客体形式”、“直观”、“感性的人的活动”、“实践”。前两个是费尔巴哈的局限，后两个是马克思的突破。费尔巴哈看到的是既成的、静态的对象世界，马克思看到的是通过人的活动不断生成的对象世界。对象性关系不再是给予的，而是创造的。

同时，马克思还实现了对抽象人的解构。这直接针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伦理根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哲学史上关于“人”的定义的革命性转变。费尔巴哈的“人”是孤立的个体通过“爱”联结而成的“类”，马克思的“人”是始终处于具体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存在。对象性关系不是“我-你”的情感纽带，而是由生产关系、交往关系、政治关系等构成的复杂总和。并且，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仅仅完成了对观念层面异化的消解，却未能深究异化产生的现实根源。世俗世界的矛盾与分裂，才是各类观念异化滋生的土壤。因此，想要真正化解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扭转扭曲的社会关系，不能止步于观念层面的改造，而必须直面并改造产生问题的现实社会基础。

在《提纲》中，马克思的哲学使命实现了根本转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费尔巴哈正是“解释世界”的典型——他用对象性理论与人本主义伦理对世界作出了新的解释，但这种解释无助于改变现实的苦难。马克思则要求哲学成为“改变世界”的武器。这一转变的枢纽，正是从“直观的对象性”到“实践的对象性”的跃迁。

《提纲》虽然还未展开系统论述，但已经清晰地勾勒出新世界观的基本轮廓。对象性不再是感性直观的被动关系，而是实践活动的能动创造；人的本质不再是抽象的爱，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改变世界不再是道德呼吁，而是对世俗基础的革命改造。接下来，马克思需要做的是将这个纲领系统化、具体化。

4. 马克思的超越：作为“实践对象性”的历史唯物主义

4.1. 《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阐述

1845~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首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这部著作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对新世界观的建构紧密结合，对象性理论获得了完全历史化的阐释。

《形态》开篇就确立了一个根本前提：“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

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8]这里的“现实的个人”区别于费尔巴哈“抽象的个人”，关键就在于他们是从事活动的。活动首先是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8]

马克思将这种生产活动称为“实践”，并赋予其基础性地位：“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哪怕它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这段话彻底颠覆了直观唯物主义：对象世界不是现成给予的，而是世代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每一代人都在前人创造的对象性世界中活动，同时又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这个世界。对象性关系由此获得了历史性和生成性。

在《形态》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对象性关系如何具体化为各种社会关系，实现了从“感性对象”到“社会关系”的具体化。马克思指出：生产活动内在地包含双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和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关系)。费尔巴哈只看到前者，而且将其理解为直观关系；马克思则看到，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下发展的，而生产关系本身也是对象性活动(交往活动)的产物。

马克思辛辣地讽刺费尔巴哈：“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而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癧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病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8]当面对现实的社会苦难时，费尔巴哈只能求助于道德直观和抽象的爱，而马克思则要求分析造成这些苦难的具体社会条件——私有制、分工、阶级对立等。对象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雇佣劳动关系、商品交换关系、资本剥削关系，这些都不是通过“爱”能够化解的。

4.2. 对象性关系的历史形态与资本主义批判

马克思在《形态》及后来的《资本论》中，进一步将对象性关系理论发展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和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在《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8]在原始社会，对象性关系表现为血缘共同体内部的自然依赖；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则表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们从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却陷入对商品、货币、资本的依赖。之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作为商品，获得了独立于生产者的神秘力量；人与人的对象性关系被物化为商品交换关系，进而被货币关系、资本关系所掩盖。这是费尔巴哈异化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不仅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商品、货币、资本都是人类对象化活动的异化形态。但马克思的分析远比费尔巴哈深刻：他揭示了这种异化不是观念错误，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

4.3. 从伦理抽象到革命实践

基于对对象性关系的全新理解，马克思彻底摒弃了费尔巴哈抽象的道德救赎路径，确立了通过革命实践改造世界的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明确表示：“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这并非否定道德的

价值，而是指出：道德观念本身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所谓的“普遍之爱”往往掩盖着阶级对立。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伦理在理论上抽象空洞，在实践中可能沦为对现状的辩护。

而这里的“实践”，并非一般的活动，而是革命性的实践——旨在改变不合理社会关系的实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他已经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9]革命实践的特殊性在于：它同时改变对象世界和改变人自身。无产阶级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中，也改造着自己的阶级意识，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

不过，真正的解放不是费尔巴哈设想的在“爱”中实现抽象类本质，而是消灭造成对象性关系异化的社会条件。在《形态》中，马克思展望了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8]这描述的是一种全新的对象性关系：人不再被固定的分工所束缚，能够在自由、全面的对象性活动中实现自己的本质。但这种状态的实现，不是靠道德教化，而是靠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和旧式分工。

至此，马克思完成了对费尔巴哈的全面超越。对象性理论从感性直观升华为实践创造，从抽象人学深化为历史科学，从道德宗教转向革命实践。这一哲学变革，为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伟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5. 理论启示及研究展望

通过以上系统地梳理与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对象性理论上的根本分野及其哲学意义。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以“感性对象性”原则终结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统治，将哲学重新奠基于现实的人与自然。他敏锐地把握到人的存在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必须在与自然、与他人的关系中确证自身。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伦理作为这一原则的伦理升华，体现了对人的价值尊严的肯定。然而，费尔巴哈的理论存在三重致命局限：直观性使他将对对象世界视为既定的存在，而非历史地生成的产物；非历史性使他看不到对象性关系随生产方式演进的规律；抽象性使他的“人”和“爱”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沦为空洞的道德说教。

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正是从突破这些局限开始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继承了对象性原则，但已开始将对对象化活动与“劳动”结合，并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形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完成了决定性批判：对象世界本质上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系统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产实践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对象性关系具体化为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体系；改变世界必须通过革命实践改造社会基础。

从“感性对象性”到“实践对象性”的转变，不仅仅是哲学术语的更新，更是哲学范式的根本变革。它意味着：哲学不再是对既定世界的直观反映，而是对历史生成世界的能动介入；不再寻求抽象的道德救赎，而是分析具体的社会矛盾；不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是立志改变世界。这一变革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

这一理论嬗变对当代具有重要启示。在全球化与资本逻辑渗透一切的今天，对象性关系的异化以新的形式广泛蔓延，社交媒体中的关系异化便是典型缩影。依据实践对象性理论，人的交往本应是现实实践中双向确证自我、联结彼此的对象性活动，而当下社交媒体将现实交往置换为虚拟符号互动：人们以点赞、评论、人设展演作为主要交往形式，真实的感性实践联结被数据、流量、算法所遮蔽。结合“人

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不难发现，虚拟平台看似拓展了社交边界，实则抽离了交往背后具体的生产生活关系，使人的社会存在被简化为线上身份，人与人之间本真的对象性关系逐步虚化、物化，人也在单向度的符号互动中失去了自我确证的现实根基。重读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可以看出，面对这类新型异化，单纯依靠情感呼吁、道德感化的费尔巴哈式思路根本无法破解困境，唯有立足当下数字生产与社会运行的现实，回归现实的实践对象性，重建人与人之间基于真实生产、生活的交往关系，才能消解虚拟社交带来的关系异化。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实践对象性理论，依然是我们剖析当代社会问题、批判现实、想象未来的重要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 [1] 赵明坤. 青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本体论思想的批判和超越[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2] 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 1984.
- [3] 刘嘉文. 试论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哲学创立过程中的意义[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17.
- [4] 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M]. 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84.
- [5]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6] 王焕成. 马克思宗教观与费尔巴哈宗教观的比较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苏州: 苏州大学, 2016.
- [7] 邓安庆, 钟锦, 主编, (俄)梁赞诺夫, 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1 版 第 2 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8.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9] 邓安庆, 钟锦, 主编, (俄)梁赞诺夫, 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1 版 第 3 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8.